

北魏孝文帝 时期平城宫殿建设的考证

□ 段智钧 赵娜冬 吕学贞

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313年拓跋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1]时便应有所计划,但其时可能主要是以修整汉代平城县的城垣和建筑为主。后来拓跋鲜卑盛衰不常,平城县也经历了战乱,至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迁都于此之时虽然可能有所整饬,但平城县的城市结构、功能、防卫及其面貌等可能已大不如前。因此,其后北魏数代统治者又不断对平城进行建设和拓展,以适应其都城的地位和职能,其中不仅逐渐完善了城垣防卫体系和城市基础设施,还有大量俊美的宫殿和城市建筑拔地而起,这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分裂动荡时期弥足珍贵。

至孝文帝时期,在建筑制度方面北魏统治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相关建设水平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为孝文帝实施全面汉化改革所带来的文化高峰进行了较为充足的观念和物质准备。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全面梳理和现有考古发现的科学分析,我们系统地考证了北魏孝文帝时期平城宫殿的基本情况。

太和殿是文明太后冯氏的居处,太和元年(477年)春正月,为了与改元“太和”呼应,孝文帝拓跋宏“起太和、安昌二殿。”^[2]时至“秋七月……己酉,太和、安昌二殿成。起朱明、思贤门。”^[3]而太和殿所对应的宫门应为朱明门,安昌殿所对应的宫门应为思贤门。这两座完整的宫殿组群的前身应为此前文明太后所居的中宫及以西的太华殿后的部分寝宫。至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崩于太和殿,时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华殿。”^[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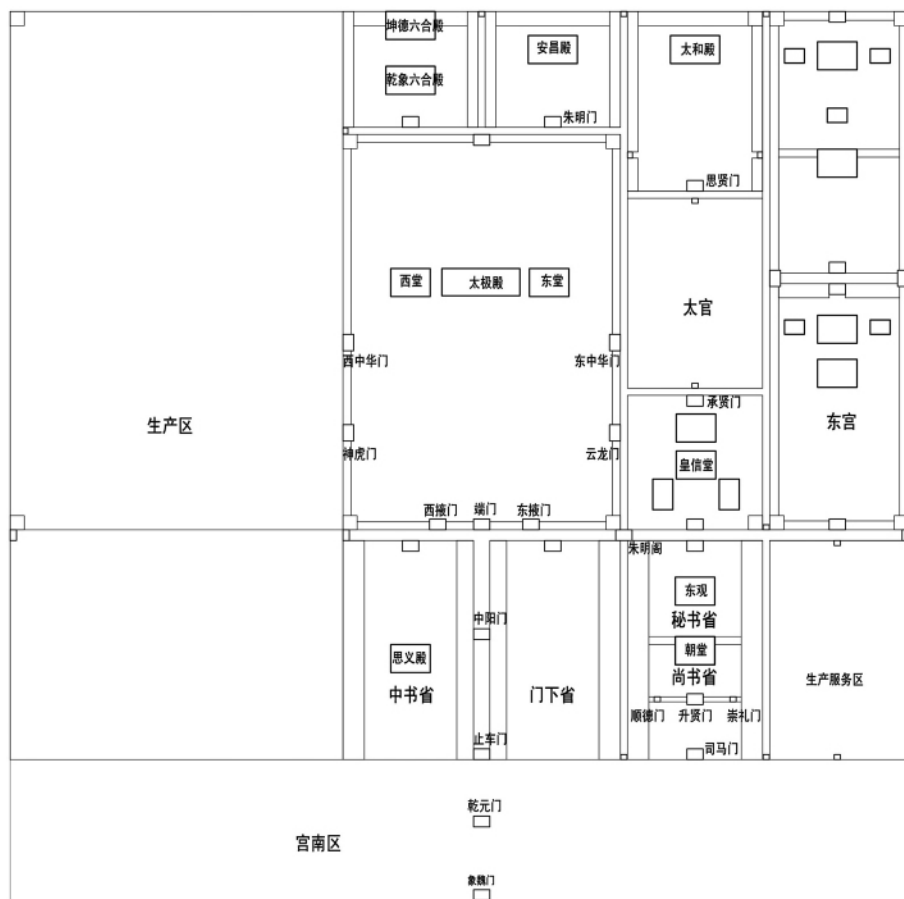
太和十四年冬十月,为文明太后安葬后,孝文帝拓跋宏在太和殿设祔祭,“庚辰,帝居庐,引见群僚于太和殿,太尉、东阳王丕等据权制固请,

帝引古礼往复,群臣乃止。”^[5]“既而,帝引见太尉丕及群臣等于太和殿前,哭拜尽哀,出幸思贤门右”^[6]。此后的太和殿就作为一座太后庙堂使用,称为“太和庙”,如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甲子,帝袞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7]而安昌殿作为太和殿以西并列的宫殿,当在太华殿的正北偏东,相当于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与朝仪正殿天文殿相对应的后寝之处天安殿的位置。随着太和十六年(492年)太华殿改建太极殿的扩展,“破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8],挤占了安昌殿所在宫院南部的一些基址,太和殿院落的西北角得以直接与太极殿东堂毗邻,而安昌殿实际院落变小,到太和十六年(492年)则成为了明确的内寝之地,“十有一月乙卯,……以安昌殿为内寝”^[9]。

关于安昌殿宫院南部被压缩的问题,或许可以用东西向宽大来加以解释。因占据原来的新东宫两条轴线宽度的太华殿(后来的太极殿)后寝位置同样十分宽大,便有所建设,“(太和)三年(479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二月……壬寅,乾象六合殿成。”^[10]史不详述,鉴于坤象地,乾象天、象君、象阳,此二殿很可能形成南北相对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此二殿的建设很可能是477年太和、安昌二殿建设在太华殿后寝的延续。后来压缩广阔的后寝进深,将其南部分出一部分给宏大的太极殿院落也是合理的。

酈道元《水经注》提到太和殿与建于太和十六年(492年)的太极殿之关系,以及太和殿的情况,“(太极殿)东堂东接太和殿,殿之东阶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阳八风谷之缙石也。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11]。

太极殿的前身就是太华殿。孝文帝拓跋宏在



图一 孝文帝时期北魏平城宫殿推测图

位前期,太华殿作为朝仪正殿使用频繁,并达成了此前少有的综合功能,如颁定律令、宣明敬老、飨宴朝会等等,如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元年(477年)八月,“乙酉,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12]同年,“冬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于太华殿,赐以衣服。”^[13]又如太和九年春正月,“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殿,班赐《皇诰》。”“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飨群臣于太华殿。”^[14]与此有关的文献记载颇丰。

不仅如此,太华殿当时还用于很多当时正殿的不常见功能,例如孝文帝拓跋宏对酷吏胡泥的诘责宣判也是在太华殿进行的,“(胡泥)将就法也,高祖临太华殿引见,遣侍臣宣诏责之,遂就家赐自尽。”^[15]还于太华殿举行重要朝臣的婚礼,如文明太后优待宠臣王叡,“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宾,次子又适赵国李恢之华。女之将行也,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别帐,叡与张祐侍坐,叡所亲及两李家

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及车引,太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太后嫁女。”^[16]总之,太华殿的用途空前扩展导致对朝仪正殿建筑规模、空间划分、空间品质、功能组织等需求的不断提高,很可能就是在这样大量的使用过程中,孝文帝拓跋宏对太华殿的规模和形制逐渐不太满意,因此,到太和十六年(492年),他便着手以新太极殿代替太华殿以利于改制,“(太和)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飨群臣于太华殿。……二月戊子,帝移御永乐宫。庚寅,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辛卯,罢寒食飨。”^[17]建太极殿期间,孝文帝拓跋宏暂时迁驻永乐宫。这座永乐宫位于北苑之内,建于太和元年(477年)八月,“庚子,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18]。

孝文帝拓跋宏决策坚定,加之此前营建太庙、明堂等大型建筑,工匠们积累了很丰富的宫城经验,就在太和十六年(492年)开工当年,这座工程浩大的太极殿就建成了,“冬十月……庚戌,太极殿成,大飨群臣。”^[19]太极殿建成之时已

近隆冬,“时太极殿成,将行考室之礼,引集群臣,而雪不克殒。高祖曰:‘朕经始正殿,功构初成,将集百僚,考行大礼。然同云仍结,霏雪骤零,将由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陈所怀,以匡不逮。’”^[20]可见太极殿是当时孝文帝拓跋宏最为关注的朝仪正殿,随即投入了正常使用,“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飨百僚于太极殿。”^[21]

当然,平城这座太极殿以及相关建置与孝文帝拓跋宏倾慕汉制、追溯正统的施政态度有极大关联。史载作为朝仪正殿的太极殿最早创建于三国时代之曹魏洛阳宫中,后为西晋沿袭,“历代殿名,或沿或革,唯魏之太极。自晋以降,正殿皆名之。”^[22]晋室南渡后,建康宫中亦有太极殿,应当是仿照西晋洛阳太极殿形制而建造。孝文帝拓跋宏所建平城太极殿应当对西晋洛阳太极殿以及南朝建康太极殿都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参照,如曾派从南朝归降的蒋少游对此两地加以详细的测量调查,“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23]平城太极殿作为西晋洛阳太极殿的一个仿本,其形制如何虽未见详载,但我们可以比照南朝建康太极殿——西晋洛阳太极殿的另一个仿本,加以考察。

南宋人王应麟《玉海》中引东晋徐爱之《晋纪》提到东晋建康太极殿初创时期的情况:“孝武宁康二年(374年),尚书令王彪之等改作新宫,太元三年(378年)二月,内外军六千人始营筑,至七月而成,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24]这个形制一直得以延续至梁武帝时期。

据《景定建康志》引南宋以前旧志所云:“太极殿,建康宫内正殿也,晋初造,以十二间象十二月,至梁武帝,改制十三间,象闰焉,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内外并以锦石为砌,次东有太极东堂七间,次西有太极西堂七间,亦以锦石为砌。更有东西二上阁,在堂殿之间,方庭阔六十亩。”^[25]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年)大致为同时代之君王,二者在南北对峙中的比肩效仿之心可以想见。梁武帝很可能是受到了北魏兴建平城和洛阳太极殿的影

响,“天监十二年(513年)改造太极殿”^[26],或许是由于北朝的这两座太极殿模仿得过于惟妙惟肖,以致梁武帝有了改革太极殿十二间之旧制以超越模仿者的意图,亦未可知。从太极殿基本的东西堂制度来看,平城太极殿很可能在面广方向上增长了很多,导致其整体基址规模的极大扩张,甚至不得不挤占周边宫殿的原有位置。

从孝文帝拓跋宏为建平城太极殿所颁诏书中,我们或许也可以管窥当时他革故鼎新推袭周礼汉制的雄心:“昔轩皇诞御,垂栋宇之构;爰历三代,兴宫观之式。然茅茨土阶,昭德于上代;层台广厦,崇威于中业。良由文质异宜,华朴殊礼故也。……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当春,兴役徂暑,则广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27]其中,我们还可得知平城太极殿工程的主持者是李冲等人。

而酈道元《水经注》对于太和十六年(492年)的建设情况记录如下:“破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28]

其中,像魏门是宫廷外高大的门阙,因其魏(巍)然而高,用于悬示教令,故谓之“象魏”。史载最早可见于春秋时鲁国曲阜都中。平城的象魏门当为宫城之外门阙,应当非常之魁伟。在筑此门观前八九十年,北魏就曾建立起形制巨大的宫廷门阙,天赐二年(405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漯南宫,门阙高十余丈”^[29],显然象魏门高达十余丈也应不在话下。而且象魏门很可能与后世《辽史·地理志》中提到的“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之语有所关联。

乾元门的门名,北魏前代未见有信史载,而中阳门名此前可见后赵石虎邺城的正(宫)门^[30],可以推测乾元门应是夹于象魏门和中阳门之间的一道南向宫门(作为多道宫门中之一)。

而端门也是宫殿中常用的南向正门,多见用于大朝正殿之前的路寝之门,这里应为太极殿之宫门,而且在道武帝时期的正殿天文殿前就已设

置。

至于东、西二掖门,则存在多种可能,一种可作为路寝之门左右的南向旁门;一种可为大朝庭前东西侧门,还可能为大朝殿下通往后殿之左右两小门。

云龙门、神虎门、中华诸门往往是联系非常紧密的,根据北魏相近时期曹魏、两晋、南朝的宫城布置情况,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华门分东、西各一,作为大朝殿前东西侧门,那么此时云龙门、神虎门则居于大朝庭之东西;另一种可能则是中华门分东、西各一,作为大朝庭之左右侧门,云龙门、神虎门分别出东、西中华门迤外。我们认为前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郦氏《水经注》中所反映的太极殿建设活动之目的其实非常清晰,即主要工程就是为了将平城宫殿的大朝正殿所在轴线全面地仿照汉晋以来沿袭下来的宫室门阙制度,如太极东西堂、朝堂,以及按照当时理解水平恢复都城三朝五门制度。其中“夹建”并“饰以观阁”的上述这一大组门阙,应当都是居于太极殿之前,与大朝仪制建设配套的硬件设施。而且,由于平城宫殿历经数次大规模的改建改造,已经使最初参照的邺城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尤其道武帝时期的天文殿轴线上南北轴向的门殿对位关系已极为混乱,因此孝文帝拓跋宏就结合当时施行的汉化新政,参照汉晋以来的传统正殿前部空间进行了上述宫殿新制的建设。

平城太极殿实际只使用了不到三年,到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拓跋宏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及高祖欲迁都,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31]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的大量决策以及留守善后部署等也都是在太极殿进行的,“十有八年春……二月……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三月……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

下面我们再看建于太和七年(483年)的皇信堂,“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32]之后,“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33]还有,“又议政于皇信堂。”^[34]曹魏邺城大朝以东的南北轴线上有与大朝完全并置的听政殿存在,想来皇信堂的建设与君王试图更多参与国务的意旨有关。

具体如太和十六年,“五月癸未,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徙限制,帝亲临决之。”^[35]此时的皇信堂有点类似于“内尚书省”的味道。又如,“高祖、文明太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36],下至公卿上至王公均可及此,“文明太后、高祖并临皇信堂,引见王公。”^[37]相关记载还有很多,“太和中,高祖宾礼旧老,……文明太后、高祖引见(毕众敬)于皇信堂,赐以酒饌,车一乘、马三匹、绢三百匹,劳遣之。”^[38]在皇信堂中既称诏见引见,说明其位置应在宫禁之地。

因皇信堂居于宫禁,便常于其中施内廷仪轨,“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39]皇信堂此时有如宫内聚会之客厅,“高祖尝与简(齐郡王简)俱朝文明太后于皇信堂,简居帝之右,行家人礼。”^[40]依照太和十六年(492年)的规制,“十有一月乙卯,依古六寝,权制三室,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下为外寝。”^[41]则皇信堂所承担的果真是这样的汇通内外的窗口职能。推测其中的“四下外寝”当指宫南的中书、门下、秘书、尚书各省。《水经注》也提到皇信堂的具体位置,“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堂南对白台,台甚高广,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国之图策秘籍,悉积其下。台西即朱明阁,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42]由于太和殿的前身中天殿组群之南可能是太官之地,如为“南接”者则必是太官等,文中既然称为“南对”,或许所指重点是大型主要建筑区域的对位关系。如此,则太和殿南之思贤门与皇信堂北之承贤门所对应的意旨也颇明确。另外,这里出现的朱明阁与前面提到的安昌殿之朱明门的南北呼应联系的意味也较明确。

我们再看继太和殿之后建成的几座宫殿。

太和四年(480年)九月建成宫殿两座,“乙亥,思义殿成。壬午,东明观成。”^[43]

关于思义殿,还有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六年春正月驾临的记载,“戊辰,帝临思义殿,策问秀

孝。”所谓策问是以政事、经义等设问以求秀才、孝廉、贤良以及各曹官员之对策而加以考核,对此“临思义殿策问秀孝”事《玉海》有注云:“太和初,孙惠蔚郡举孝廉,对策中书省。”^[44]那么此当策问之用的思义殿应在中书省之内。按照魏晋以来尚书、中书、门下及秘书各省常例,“中书之官旧矣,谓之中书省,自魏晋始焉。梁陈时,凡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后魏亦谓之西台。”^[45]再结合前述新东宫与中书省佐近的情况,我们认为中书省大致应位于止车门至端门一线以西,与之对应,称为“东台”的门下省则位于止车门至端门一线以东。如果整体上居于平城宫城北部的前述平城东宫、中宫、西宫、永安宫等帝后朝寝宫禁之地可称为“宫北”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与思义殿相关的中书省、门下省以及后面提到的秘书省和尚书省等称为“宫南”(或“南宫”^[46])。这个附近可能还在隙地建有少量亲近君王的高级仕宦的宅邸,如“天赐四年,诏赐(庾)岳舍地于南宫,岳将家僮治之。”^[47]

接下来看与中书省、门下省同在宫南的秘书省。

太和年间有秘书丞李彪常年主持秘书省工作的记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48]其中,东观为秘书省藏书、校著之处,当时成为“典司经籍”之秘书省的代称。汉代以来秘书省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监录图书,在汉惠帝永平年间,“复别置秘书监,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居于外。(原注曰:汉初,御史中丞掌兰台秘书图籍之事,至魏晋,其制犹存。故历代营都邑,置府寺,必以秘书省及御史台为邻。)”^[49]秘书监(省)自此便不布置在宫闱禁地,而与各省居于宫南之一区。又如北周庾信《皇夏乐》诗所云:“南宫学已开,东观书还聚。”显然,秘书省位于东观所在之宫南当为常例。

再看秘书省的另一大职能。因为秘书省掌握国家核心图籍资料,所以在辨识疑难、起草文书方面有绝对的发言权。在太和末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之时,“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义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冲积其前后罪

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50]这条记录一方面可反映秘书丞李彪具有“法官”的职责,即执掌法律解释,判断疑问刑狱等。另一方面也反映其所执掌的秘书省与所兼理的度支尚书职下尚书省有关机构的临近关系。而度支尚书掌管尚书省诸曹中有关全国财赋的度支、金部、仓部、起部等四曹。上面这条记录说明平城南宫尚书省的这四曹与秘书省临近。虽然没有发现秘书省与尚书省相对位置关系的准确记载,但是若二者临近,从东观藏国家核心图籍安全和秘书省治事清净的角度,我们认为秘书省相对尚书省来说应更靠近宫北区域。

关于与前述思义殿同期完成的东明观,其完整记录为太和四年(481年)七月,“壬子,改作东明观。”至八月,“壬午,东明观成。”^[51]这说明东明观很早之前便已存在。又根据太和十五年孝文帝拓跋宏在东明观的记载,“五月己亥,议改律令,于东明观折疑狱。”^[52]既然此东明观与秘书省所承之责有关,那么此东明观很可能也位于秘书省之内。尽管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但此东明观与东观、白台等所指为同一,也未可知。

按照魏晋之常例,朝堂是尚书省的最重要建筑,“形成宫中东侧的次要轴线,与太极殿处的主轴线东西并列”^[53],各曹部吏有事则在朝堂参议,如有必要则将疑难者责成专人入宫禁内启闻君王。而当时的君王亲临朝堂次数往往较少,主要是参与一些事务决策并考察官吏,即所谓“考百司而加黜陟”。例如太和十七年(494年)五月,“甲子,帝(孝文帝拓跋宏)临朝堂,引见公卿已下,决疑政,录囚徒。”^[54]君王亲临朝堂往往被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被记录下来。如太和十八年闰二月,“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55]太和十八年九月还是在平城宫,“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56]因此,尚书省与宫北联系并不紧密(尤其孝文帝拓跋宏建皇信堂为中寝执事后)也为合理。

通过以上对古代文献的爬梳,我们试图以“后见之明”构建一个历史解释框架去容纳最大涵盖范围的历史事实,具体对已经失去的平城宫城相对位置关系等尽力加以复原考证,推测性地整理出这一距今1600余年的古代都城的相关历

史踪迹,权为一种可能的推证和解答,其核心成分就是让相关史实得以被这个框架所解释。虽然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并且对于历史文本真伪判断以及既有历史构图和解释的校订尚无力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让史料说话以实现“历史学高贵的梦想”却总是我们心之所望。只是目前绝大多数北魏平城宫殿遗迹仍埋地下,期待今后不断得以揭示验证。毋庸置疑,我们总是处在不断逼近历史真相的途中。

[1]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帝纪第一,序纪。

[2] 同[1],帝纪第七,高祖纪上。

[3] 同[1],帝纪第七,高祖纪上。

[4] 同[1],列传第一,皇后列传。

[5]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6] 同[1],志第十二,礼四之三。

[7] 同[1],志第十,礼四之一。

[8][11][28][42] 酈道元《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卷十三·漯水。

[9][19][41]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又见于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册府元龟》,卷十三,对此的记述为:“(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依古六寝,权制三室,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合殿为外寝。”

[10]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12][13] 同[1],帝纪第七,高祖纪上。

[14]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15] 同[1],列传酷吏第七十七·胡泥。

[16] 同[1],列传恩幸第八十一·王叡。

[17]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18] 同[1],帝纪第七,高祖纪上。

[20] 同[1],列传第十八·楼伏连。

[21]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22]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初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卷二十四。

[23] 同[1],列传文艺第七十九·蒋少游。

[24]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玉海》,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卷一百五十六。

[25] 《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景定建康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卷二十一。

[26] 《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南史》,文渊阁

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卷二十二。

[27] 同[1],列传第四十一·李冲。

[29] 同[1],帝纪第二,太祖纪。

[30] “《洛中记》曰:有铜駝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高九尺号铜骆驼。陆翽《邺中记》曰: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二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子部·类书类《太平御览》,卷九百一。

[31] 同[1],列传第二,神元平文诸帝子孙。

[32] 同[1],帝纪第七,高祖纪上。

[33]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34] 同[1],列传第四十二·高闾。

[35]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36] 同[1],列传第二,神元平文诸帝子孙。

[37] 同[1],列传第七下,景穆十二王·南安王。

[38] 同[1],列传第四十九·毕众敬。

[39] 同[1],列传第七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

[40] 同[1],列传第八,文成五王·齐郡王。

[43] 同[1],帝纪第七,高祖纪上。

[44] 同[24],卷一百十五。

[45] 《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卷二十一。

[46] 《魏书·列第十六·庾业延》记:“天赐四年,诏赐(庾)岳舍地于南宫,岳将家僮治之。”鉴于平城前期宫城南面各省外围或有空地可做显贵第宅之用,此处提到的“南宫”很可能与我们定义的“宫南”所指大致一致。

[47] 同[1],列传第十六·庾业延。

[48] 同[1],志第十,礼四之一。

[49] 同[45],卷二十六

[50] 同[1],列传第五十·李彪。

[51] 同[1],帝纪第七,高祖纪上。

[52]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53]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104页。

[54][55][56] 同[1],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段智钧,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二炮兵工程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赵娜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吕学贞,大同市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